

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 与反通货膨胀措施

李建国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曾遇到了巨大困难,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与边区的特殊自然社会、环境,国民党的封锁,和边区在金融方面的一些措施的缺陷有关。1942年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大的缓和了通货膨胀对边区经济的冲击,较成功地保障了边区的供给,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通货膨胀 反通货膨胀措施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维护边区的经济独立、对付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创立了自己的金融体制,并为维护这个体制的稳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当时边区金融业因种种条件限制,发展极为艰辛,但总体上来说,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基本任务。在边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难题是通货膨胀。造成边区通货膨胀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但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太深入、系统。故本文想就此做一些深入探讨。

—

陕甘宁边区的金融政策,在抗战时期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

而不断演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适应全民抗战需要,1937年10月,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宣布法币为边区流通货币,收回苏币。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给边区相当数量的军费补助,加之其他外援,边区的财政基本是有保障的。当时边区银行,是作为“边区政府的货币金银的出纳管理机关,维护法币的流通”^①,并兼营一些商业活动(1938年3月成立光华商店),以保障边区机关物资需求为主要目的,同时积累资金发展自己,其他业务很少开展。1938年7月,边区银行以光华代价券的名义发行了辅币,票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因当时边区“向国民党领回的八路军军费”,“小票也只给十分之一”,而法币币值较高,民间小额交易不得不“用邮票找零”^②,故边区银行发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找零,不是为了财政。边区银行这次试发辅币对物价影响不大,主要是边区当时流通的主币是法币,国民党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中聚敛了5亿盎司的白银,又得到了英、美的支持,因而抗战初期法币币值波动不大。此外,边区银行发行辅币数量也不多,到1939年底仅发行了316975元,对于管辖有30多个县的边区而言,不仅没对边区金融市场造成冲击,而且信誉良好,商民均乐于使用。如以1937年上半年物价指数为1,到1939年6月约为2·02,攀升不大,边区发生的通货小幅膨胀在战时经济条件下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边区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是在1939年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公布后,特别是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

① 《陕甘宁边区银行历史沿革及档案整理简况》(1949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② 南汉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1947年5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20页。

党开始在经济上给边区制造麻烦,加之边区为防备国民党进攻,将三五九旅调回边区,边区财政困难加大。但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大局,边区银行只是加大了光华代价券的发行,从1940年初到10月,共发了693785元。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停发了八路军军费,加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因而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断绝,财政发生突然困难”,“为着保障供给”,“满足经济的迅速发展”,边区银行不得不“主动的(地)有计划的(地)大量发行边钞”。^①这时边区政府一面增发光华代价券,一面考虑正式创建自己的金融体系。1941年2月边区银行正式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②并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了23064950元(边区货币发行量见下表)。

抗战期间边区银行发行的三种货币数量统计表

货币名称	发行起——止日期	发行总额
光华代价券	1938年7月——1941年2月	4308215元
边币	1941年2月——1944年5月	3164400000元
商业流通券	1944年6月——1945年8月	724702500元

注:(1)1941年2月发行的有光华代价券,也有边币(41600元),统计表已将边币分出计算。

(2)1943—1944年5月发行的边币原表折合为流通券,为方便读者本表将其均按边区政府定价还原为边币。

(本表根据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1943年5月27日)、《三

① 《整顿财政——第一次高干会议的报告》(1942年1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27页。

② 《陕甘宁边区关于发行边币的训令》(1941年2月2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年来边币发行和分配情况)(1943—1945),《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35、142页编制。)

1940年冬因边区增发货币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的通货膨胀开始加剧。1941年底边区银行发行的光华代价券、边币总量达2737165元,加上法币(边区政府虽宣布禁止法币,但实际上法币仍在流通),流入市场的货币量大增。但与此同时,因国民党封锁,流入物资又大量减少,造成了边区物资奇缺和物价暴涨。以延安为例,如以1941年元月物价指数为100,到12月涨到532·8,以致于1941年5月就发生了金融风波,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三边等地都拒用边币。法币因禁用后市面流通量减少,并可以在国统区套购到物资反而升值,边币由原定的1边币兑换1法币跌到2·49比1。^①此后因边区既要支持抗战,又要发展生产,造成边币发行逐步加速,在整个边币发行期间(40个月),仅1944年1月递增率是负4·8%,有27个月递增率在两位数以上,最高月份是71·1%。^②因而物价扶摇直上,边区物价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了国统区(见下表),造成了边币大幅贬值。到1944年初,陇东边币与法币黑市比价已涨到22:1;绥德为17:1;三边为19:1;延安也达到12:1。^③边币币值的暴跌,使得法币大肆侵入边区。

1939年底至1945年8月物价上涨指数比较表

时间	延安物价上涨指数	重庆物价指数
1939年12月	337	177

① 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1943年5月27日)(第5编),第129页。

② 参见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1943—1945年边币发行统计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25—136页、第142—145页。

③ 《自二届参议会以后的金融工作报告》(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59页。

1940年12月	717	1094
1941年12月	4421	2848
1942年12月	13773	5741
1943年12月	343060	20033
1944年12月	768808	54860
1945年8月	2301811	179500

注:本表以1937年上半年延安、重庆物价指数为100。

本表根据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1949年2月18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82页;吴刚:《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170页编制。

1944年6月,因要“发展生产,既无法回笼边币,又不能以法币投资”^①,同时也是为了打击法币,与法币争夺市场,巩固边区金融,开始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并规定流通券1元当边币15元(实际比价折合边币20元);当法币2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发行,除以实物和公营收入等作担保外,还“决定留法币25000万元,以20000万元作发行准备,5000万元供一个月兑换之用”。^②后又决定以1:20比价收回边币,流通券完全取代边币成为边区的本位币。但这次发行新币数量巨大,截止1945年8月底共发行724702500元(流通券),实际流通额为598218197元(流通券)。^③由于市面货币量大,物价依然快速上涨,商业流通券因而也很快贬值。

① 西北局常委会:《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致各地委电》(1944年7月29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00页。

② 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定》(1944年5月23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03页。

③ 《1943-1945年边币发行统计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43-145页。

二

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迅猛的原因,首先是边区自身社会经济落后。陕甘宁边区位于黄土高原中部,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属于大陆性半干旱区,自然条件严酷。加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军阀的任意敲诈和兵匪骚扰,当地民众极端贫困化,社会经济长期落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开始土地革命,打破了封建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束缚,到陕甘宁边区建立时,已分配土地占边区耕地面积的94·7%,分到土地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83·5%。^①抗战时,边区政府又在未土改地区进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利用抗战初期相对有利的环境,充分利用外援(主要是国民政府划拨的军费、抗日捐助等),采取减免农村税收和减征公粮等措施恢复生产。1940年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大封锁时,边区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与1937年相比耕地面积增加了3116076亩,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70000石;^②边区的畜牧业也发展迅速,羊在土地革命时期受到相当损失,只剩下四五十万只了,1940年也达到了1723037只。^③工业建设也取得一定成就,陕甘宁边区在革命前,只有家庭纺织和农村手工匠,虽有一个石油厂,在内战时已破坏,工业品完全依赖边区以外供给。1938年后,边区开始着手工业建设,到1943年边区年产煤炭91200吨;盐521000驮(近4万吨);

① 《陕甘宁边区土地问题》,《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② 南汉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1947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85-86页。

③ 《边区羊子的发展问题》(1945年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103页。

布匹共 104302 大匹(其中 62·65% 是民间所织);造纸 8139 令。^①到 1944 年边区公私营企业达 150 余家,手工作坊 1400 余家。虽然如此,边区经济总体水平仍相当落后,自给能力还是较差的。如到自给程度较高的 1943 年,边区生产的棉花也仅能满足需求量的一半多,布的自给率只有 73%。^②

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相比,经济实力相差十分悬殊。当时国统区仍控制有十几个省,特别是西部各省基本完整,仅西部各省人口达 1 亿左右,还有像重庆、西安、兰州等一些大中城市。因而无论从资源上、还是从人力上,国统区都占有绝对优势。特别工业方面边区更是无法相比,仅在抗战初,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内迁川、湘、桂、陕等省的民营企业达 425 家(有 1 家迁往陕甘宁边区),内有荣氏企业、裕华纱厂等一些国内著名企业。^③这些企业加上内迁的国营工业和当地一些企业,已形成了相当的生产能力。1941 年、1942 年、1943 年国统区电力、钢铁、化学品、棉织品、面粉、液体燃料、煤等 15 种基本工矿产品总产值分别为:12163 万元、13849 万元、14757 万元(按 1936 年法币币值计算)。^④1944 年国统区有工厂 5266 家,资本总额 48700 万元法币(按 1936 年币值),工人约 36 万人。^⑤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从苏、美、英、法等国获得各种贷款、援助总额达 211428 余万美元,截止 1945 年底实际支

① 建设厅:《1943 年工业统计表》(1944 年 4 月 1 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3 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7 页。

② 黄静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5 页。

③ 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内迁企业分省统计表),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9、230、238、249、252 页。

④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0 页。

⑤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98、101 页。

取 116110 余万美元。^① 物质条件是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战时经济更是如此,边区经济基础的薄弱,客观上决定了边区物资供应的贫乏,因而通货膨胀率高于国统区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虽都做出了让步,但在抗战路线、抗日各党派平等、及民主民生等重大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很大分歧。蒋介石虽放弃武力剿共,但其“防共、溶共、限共”,“根绝赤祸”的方针并没完全放弃。而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和反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斗争也一刻没停止过。只不过斗争形式“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② 两党的这种政治斗争必然会反映到经济上。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方针,就是要努力保证边区的政治独立性和抗日军民物质需要。1937年10月,当时的苏维埃银行西北分行虽奉命改组为边区银行,但仍有相当的独立性,它是边区政府货币金银的出纳管理机关,直接受边区政府领导。国民党顽固派在统一战线建立不久,除对边区军事包围外,还利用各种方式干扰破坏边区经济。1938年2月,国民党西安行辕主任蒋鼎文通令陇东各县,不得与边区政府发生关系,并利用地方武装制造摩擦。1940年国民党环县县长,直接指挥土匪到边区烧杀抢掠,抢走军粮 130 余石,牛驴 150 余头,羊 10000 余只。在边区的 5 个区, 21 个乡造成了极大混乱,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生产。^③ 国民党的步步紧逼,给边区社会经济造成了不少困难。

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企图从经济上困死边区

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9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54 页。

③ 阎庆生、黄正林:《庆阳简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4 页。

政权,停发了八路军军费,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凡运往边区的各种物资,不是国民党政府批准的,一律以通匪论罪。如在陇东地区,从镇原屯子到边区孟坝,70里间有5道封锁线,从西峰到驿马40里,有4个哨站。国民党政府在陇东重镇西峰设立了一个“百货验货厂”,凡运出、运入的物资都必须到“验货厂”报验登记,“转运它地销售的货物,还要办理觅保手续和交付押金,等到这宗货物运到销售地卖出后,再拿该地商会签发的证明文件,回到西峰退押,否则,不仅押金没收,而且还要追究问罪”。^①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输出品也设法尽力阻止,如“过去,一张羔皮普遍价值白洋一元,能买小布二三丈,好的刨羔皮,一张可卖到五六元,可买布三匹”。而在封锁后“一个羊羔连一尺布也换不到”。^②对于国统区奇缺的食盐,也在西峰等地借开设“公卖店”,加以控制,甚至从青海运盐以抵制边区食盐。后因战时运力紧张,连他们的公职人员和士兵吃盐都成问题,便借食盐专卖,尽力压低边区盐价,高价倒卖。1943年春,国民党当局对边区食盐每百斤加税18·4元(法币),到同年秋提高到120元(法币),以抑制边区周边地区民众的食盐消费。^③更为严重的是公开抢劫和没收边区货物。1944年1-7月仅边区陇东贸易公司被没收的各种货物价值405579470元边币。被没收的食盐达19万斤,计值28500000元边币。^④甚至发展到杀害到边区的商人。如1943年4月,庆阳商人刘怀远兄

① 陈凯:《陇东盐业贸易的反封锁斗争》,《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5页。

② 《边区羊子的发展问题》(1945年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第107页。

③ 陈凯:《陇东盐业贸易的反封锁斗争》,《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第56页。

④ 贸易公司:《国民党对边区封锁材料》(1944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页。

弟,因从西安等地往边区运货,被国民党军队拦截并杀害。国民党的封锁对边区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如对外贸依赖性较强的养羊业,因国民党的封锁,使得边区农民养羊无利可图,1940年后出现羊只大量死亡。

第三,边区对金融问题认识和政策上的缺陷。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当时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去认识,因而难免在有些问题处理上欠妥。首先表现在准备不足。1940年10月前,因有军费补助和外援,边区财政对边区银行依赖不大,银行资金的1/4,甚至近1/2放在自营商业上,“银行的营利80%以上得自商业”。^①国民党封锁边区后,迫使边区的金融政策全方位调整,边区银行的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但当时的银行实质是商业银行,一时间因缺乏准备,难以适应调剂财政,投资生产,扶助公私经济,周转贸易,稳定物价,代理金库,经理公债,支持抗战的要求,仓促间大量发行钞票,又无足够的准备基金,主要依靠边区的食盐作为边币发行的物质担保。但食盐仅是一种潜在的资源财富,只有当食盐换回法币和必需品来,才能使边币达到巩固。因而边币发行实际上是缺乏担保的。

怎样处理法币也是边区银行面临的一个难题。当时边区政府想通过收兑法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使边币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本位”。^②并利用边区银行存储和收兑的法币,向边区外购买边区紧缺物资。但实际上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

① 边区银行:《资金来源及其分配》(1938-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74-75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行边币的训令》(1943年2月23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2辑,第166页。

4%的份额。^①这首先是因为在边区所辖 31 县(市)的 218 个区中,有 24 个县的 81 区与国统区犬牙交错,这些地区的民众生活、生产同国统区密切相关,完全切断这种联系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边区物资相对贫乏,供给政府机关和军队已感困难,更无力将民众的生活、生产物资需求包下来,因而民众必然要想法获得一些法币到邻区购物;最后,就边区政府而言,一面要打击法币,一面还要获取法币以供给汇兑。因而边币完全独占边区市场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

单纯财政金融观点。边区通货膨胀是和边区财政问题密切相关的,1941 年前边区财政因有外援,年年有节余,边区银行虽有财政垫款,但数额不大(43·7 万元)^②,对金融造不成太大的冲击。国民党断绝边区外援后,1941 年财政亏空达 567 万余元边币;1942 年财政从银行借款 7000 万元边币。^③虽银行在自身经营中尚有 1000 余万元边币的收益,但“为财政拖累”,“实际资金已经削弱”。^④由于财政困难导致把金融手段,特别是发行货币作为解决边区财政的重要手段。这种发行使边币信誉大损,也在金融界引发了很大争论,但这些争论基本局限于该发还是该收缩,以及怎样加快回笼货币等问题上,“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

① 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检查总结初稿之三》(1943 年 5 月 27 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5 编),第 32 页。

② 曹菊如:《在边区政府第 38 次会议上的发言》(1940 年 11 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5 编),第 85 页。

③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附表》(1948 年 2 月 18 日)、边区财政厅:《二年來财政收支工作总结》(1943 年 10 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6 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8、59 页。

④ 边区银行:《边区银行工作总结》(1943 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5 编),第 76 页。

子”^①，而对支持边区发展生产不太重视，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从边区银行资金走向上也可以看出：生产放款1941年为10896752元，远低于1939年水平；1942年为15075400元，虽数字有所增加，但因边币贬值，实际投入大大减少，仅占当年银行放款额的19.1%。^②

三

为了对付通货膨胀，边区政府在边币发行不久就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加强了对法币的政府控制，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流通，实行进出口商贸货币兑换制，严厉打击法币黑市，以便形成边币的独占市场，通过扩大边币使用范围，减轻边币膨胀压力。但“边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友区在经济生活上密切联系着”。“而且我们的边区还不能自足自给，我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主要的依靠友区输入，是用法币购入的”。^③因而这一措施很难行得通。其次，提出“要从平衡对外贸易和平衡财政上的收支入手”。^④但要做到平衡贸易，边区必须要有足够的贸易物资，而边区的现实情况则是物资匮乏，原有的一些传统贸易物资也因国民党的封锁很难销出去。如边区的“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除盐外其他两宝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93页。

② 边区银行：《两年来放宽工作初步总结》（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392页。

③ 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1943年5月27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203页。

④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1月8—9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均出不去”，而食盐“利润很低”，贸易自难平衡。财政平衡在战时经济条件下，实际上无法做到。第三，回笼边币，大力鼓励人民存款。1941年还发行了“有奖储蓄券”100万。但当时边区大多数农民生活并不富裕，无多少钱去存储，同时“农民没有这些习惯，也不幻想发这样的洋财”^①，结果变成了摊派，效果适得其反。如果以1942年下半年同1937年下半年相比，虽存款票面金额增加了约34倍，但按实际购买力折算，仅是1937年的27.3%。^②第四，1941年还提出了“物价平准基金”，利用光华商店批购的货物作平抑物价的准备金。但物资有限，光华商店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最后，1942年7月还采取了紧缩通货政策，规定9月底以前，边区银行业务处和商业处的光华商店，要收回边币1200万元。并大量收回欠款，暂停了许多贷款，这种办法对边区发展生产显然不利。此外，当时银行的主要负担是财政造成的，而这些财政支出又是必不可少的，仅1942年边区银行对财政放款达35%以上，显然财政困难不解决，收缩也很难实现，到了年底边区银行为了支持生产，解决财政问题，又不得不增发货币。因而在1942年底，尽管边区政府为对付通货膨胀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实际效果有限。

1942年底边区政府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边区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毛泽东同志对单纯财政观点和“收缩论”等不正确认识进行了批评，指出“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明确提出“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

① 南汉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报告》（1947年5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26页。

② 《陕甘宁边区银行五年来各种存款指数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376页。

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①在总方针的指导下,边区政府和金融业都加大了对生产和贸易的扶持力度。1943年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进一步统一了对财经的领导,明确提出今后边区银行发行:“财政周转占30%,经济周转占50%,金融周转占20%”的方针。^②加之这时边区大生产运动已见成效,这就为解决边区十分严重的财政金融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边区高干会议后,政府在发展生产、丰富物资的基础上,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粮、棉、布、食盐等重要物资,对公职人员和机关团体采用实物配给制,对部分工人甚至农民也用实物作报酬。如公盐代金制规定:农民替政府运盐,每驮政府只收105斤,剩余45斤作为运费归农民所有,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对边币的依赖度。到1944年,“财政开支绝大部分是用实物”,“各机关自给60%多,都是实物,公家发的粮食、草料都是实物,不用钱买,这两样总计就占76%。另外财政厅发的24%,也不完全是用钱买”,“所以财政开支用货币表现出来的部分是很小的”。^③边区采用的这种办法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虽边区外援断绝,工业能力极弱,但农业仍有一定基础,加之还可以利用军队垦荒,尚有潜力可挖。所以说将边区抗战经济着重点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同时尽量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不失为一种良策。这样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政困难,也减缓了财政开支拉动货币发行,货币发行又造成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又需更多财政支出的恶性循环,一定程度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93、895页。

② 郑戈桓:《陕甘宁边区的金融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88页。

③ 南汉辰:《与中国记者谈话》(1944年7月23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11页。

当时解决通货膨胀另一比较有效的方法是支持和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1943年3月,在延安南区成立了第一家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沟门信用合作社,该社在政府扶持下,采用农民自愿入股的方式,将农村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用以信贷,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群众,同时防止了高利贷对农民的过分剥削。边区政府抓住这一典型大力推广,号召学习南区信用社的办法,“吸收民间游资,转入生产,流通金融”。^①边区银行对信用社也采取了帮助资金周转、帮助建立会计帐目等扶持措施。因信用社实行随行就市的存贷利率,并对农民生产资金优先满足和适当优惠,这样既达到了灵活调剂农村金融的目的,又适当照顾了贫苦农民的利益,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1944年底全边区已有30多个信用社,存款达到5亿边币,吸收白洋1万元,元宝10余锭,手镯40副。^②过去边区银行吸收存款难的问题,现在通过信用社得到了解决。“如果没有信用社,不仅游散与停顿著的资金难于吸收,而民间生产资金不足,高利贷者必然复活盛行。倘银行欲大量放款去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影响它本身的支出与发行”。^③到1945年信用社发展到了80余处,吸收存款达15亿元(边币)。^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减轻银行压力和降低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

在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问题上,后来人们已经认识到:“边区与

① 《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决议》(1944年7月7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628页。

② 萧长浩:《介绍边区的信用合作社》,《解放日报》1945年7月1日。

③ 萧长浩:《介绍边区的信用合作社》,《解放日报》1945年7月1日。

④ 郑戈桓:《陕甘宁边区的金融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89页。

友区的经济关系,决不同于两个国家的经济关系”。^① 由于边区物资相对贫乏,有许多物资必须依赖国统区,这就决定了法币在边区有一定市场,采取完全禁止法币流通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但要保证陕甘宁边区金融体制的独立性,又不得不控制法币在边区的流通。在这个问题上边区政府采取了相对灵活务实的措施,改变过去完全取缔法币、将法币收归政府、打击黑市的办法,对法币的禁令有较大的放松。边区银行随行就市公开兑换法币,如军民确实有需要可到银行直接兑换,“不怕有黑市存在”,实行以“明市领导黑市”。^② 采取这样较灵活的方针,可明显减少黑市货币投机造成的边币波动,同时还可以较充分利用法币,鼓励私人商业贸易,充实边区物资储备。1944年7月,边区银行发行商业流通券时,进一步利用法币,公开宣布以法币做发行准备和兑换金。很显然边区政府对法币政策的调整,对稳定边区金融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高干会议后,边区政府在对付通货膨胀方面的一些措施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从币值上看,边币1943年后贬值速度加快,但实际上边区的财政状况是好转的,彻底扭转了国民党封锁边区后,“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局面。^③ 如考虑到战时经济环境,以及边区经济的对外依赖性(1943年后国统区经济恶化,以重庆为例物加指数比1942年上涨3·5倍左右。),边币的这种贬值也就不足为奇。一些事实也说明1943年后,边币大幅贬值是和外来产

① 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1943年5月27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204页。

② 王思华:《再论如何稳定目前金融》,《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287页。

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94页。

品有关,对本地货物还是有相当购买力的。如1943年底在延安,麦子每斗(30斤)3500元;小米每斗2500元;猪肉每斤700元。到1944年5月底,麦子、猪肉价格持平,小米每斗下降了100元。但同期外来品涨了60%,也有涨100%的,如边区还不能完全自给的棉花,也由每百斤(大秤)25万元左右上涨到33万元。^①边币贬值也与当时抗战形势变化有很大关系。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彻底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许多机关、后勤单位和学校撤回边区。仅军事院校就有:抗大二分校、三分校、七分校、第二分校附设中学、第七分校陆军中学;1944年第二分校陆军中学、太岳陆军中学也相继撤入边区。陕甘宁边区因此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1941年边区每百人养活4个脱产人员,1944年每百人养活将近9个脱产人员^②,造成财政开支剧增。1943年仅军务费就占当年财政开支的44%,1944年军务费仍高达45.8%,1945年军费、抗战胜利后部队和干部开赴前线的服装费、出发费合计占到54%。^③这些导致了银行为了应急增发货币。此外,边区的实物配给制使得边币使用范围缩小,边币相对市场流通量加大,也一定程度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总体而言,因大力发展生产,政府掌握了相当的实物,基本上可保证边区军民的基本需求,加之金融政策的

① 黄亚光:《与中国记者谈话》(1944年7月23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15页。

②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第8页。

③ 参见边区财政厅:《陕甘宁边区三年来财政工作报告》(1944年9月)、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关于财政上的几个问题——高干会议发言提纲》(1946年5月8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第69、77、82页。

调整,这时的通货膨胀对边区经济的实际损害比1941年大为降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在战时条件下也是无法避免的。总的来说,陕甘宁边区在金融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在当时物资极端贫乏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边区人民支持下,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困死边区的企图,基本保障了边区经济的稳定和抗日军民的需求。在抗战八年中,边区人民总共提供公粮1014544石,最高年份占到收获量的13.85%,人均负担1.3斗;据不完全统计边区人民还交购粮70119石(缺1937年数)。1941年到1945年边区人民提供的各类财政收入为459亿多元(边币),折合粮食为1389986石。^①此外边区人民还提供了大量草料、棉花、土布等,并生产运销了大量食盐,做了大量军鞋。这对于不到150万人口又十分贫瘠的边区而言,人民所做出的自我牺牲是巨大的。正是有了边区人民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才战胜了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确保了抗战后方的稳固。并“解决了日本投降后大批干部外出的经费”;“为1946年供给标准的提高准备了物质基础”;并“顺利地进行了1946年的复员工作”,^②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李建国,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参见《陕甘宁边区历年粮食收支对照表》、《陕甘宁边区历年财政收支对照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第90、89页。

② 黄静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56页。